

水滸傳

施耐庵 羅貫中著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施耐庵
罗贯中 著

水 滸 傳

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施耐庵
罗贯中 著

水 滸 傳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水 滸 传 (共三册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河北人民出版社重印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保定市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86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44 $\frac{7}{8}$

197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5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317 定价3.00元

10019

毛主席语录

《水浒》这部书，好就好在投降。做反面教材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

《水浒》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。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。宋江投降，搞修正主义，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，让人招安了。宋江同高俅的斗争，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宋江投降了，就去打方腊。

鲁迅论《水浒》

一部《水浒》，说得很分明：因为不反对天子，所以大军一到，便受招安，替国家打别的强盗——不“替天行道”的强盗去了。终于是奴才。

——《三闲集·流氓的变迁》

前 言

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：“《水浒》这部书，好就好在投降。做反面教材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。”

《水浒》全书贯穿一个主导思想：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，因此最后接受招安。它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，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，实质上是反对农民革命，适应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。

十二世纪初期，在北宋王朝反动腐朽的统治下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极其尖锐。大约与江南地区方腊起义同时，北方爆发了宋江起义。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活动范围约在今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一带地方，直接威胁着北宋都城汴京，影响很大。有关这次起义的故事一直广泛流传，并逐步形成戏剧与小说。在这一流传过程中，封建统治阶级对宋江起义故事不断加工和改造，注入反动思想。到了元末明初，《水浒》已经成书。小说《水浒》中，宋江已被精心塑造成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；作品通过对他的美化、歌颂，来达到鼓吹投降主义的罪恶目的。

《水浒》宣扬投降主义路线，是从否定晁盖及其革命路线开始的。“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

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，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。”在宋江上梁山以前，晁盖领导梁山起义军实行的正是一条反抗地主阶级统治、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。

晁盖和吴用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等人从夺取封建统治者的“不义之财”开始，走上革命道路。大名府留守梁中书将“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”，送去京城向太师蔡京祝寿。“自幼飘荡江湖”的刘唐得知这个消息，立即报与晁盖，准备中途夺取。他们响亮地提出了“不义之财，取之何碍”的口号。为了组织力量，吴用又去联络石碣村的阮氏三兄弟。阮氏兄弟是渔民，备受官府“科差”的剥削和各种敲榨勒索，终年辛勤劳动，生活却十分困苦，心头积压着反抗剥削压迫的怒火，他们羡慕梁山泊里“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官司”的起义者，早已“几遍商量要去入伙”。一经吴用联络，他们便积极地参加了晁盖主持的“智取生辰纲”的正义斗争。这一革命行动，蔑弃了封建王朝的“法度”，必然引起封建官府的疯狂镇压。在封建统治者的镇压面前，晁盖放火烧毁了自己的庄院，同吴用、阮氏兄弟等率领石碣村渔民，勇敢地歼灭了前来“剿捕”他们的官军，大灭了反动统治者的威风。他们把捉来的官军头目何涛割去双耳，教他传话给济州知府：“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、东溪村天王晁盖，都不是好撩拨的！”便是太师蔡京亲自来，也要“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”。这是公开向封建政权宣战，显示了起义农民英勇反抗的雄伟气魄。最后，晁盖决心造反到底，带领一群革命者上了梁山。晁盖做了梁山领袖后，便宣布“各人务要竭力同心，共聚大义”。晁盖的“聚义”，就是在梁山上

建立起农民革命的武装割据政权，与北宋王朝势不两立。他们“每日只是操练人兵，准备拒敌官军”。在大败济州府“征剿”梁山的反革命部队、俘获团练使黄安之后，梁山上更是积极“屯粮，造船，制办军器，安排寨栅、城垣，添造房屋，整顿衣袍、铠甲，打造枪、刀、弓、箭”，跟朝廷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在晁盖的领导下，梁山的一些普通头领也具有反抗封建王朝、反对皇帝的革命思想。朱贵在梁山酒店里捉住戴宗，拆了九江知府送给太师蔡京的信。戴宗呵斥他：“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，毁了封皮，却该甚罪！”他蔑视地笑着说：“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，便有利害，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！”

然而，《水浒》是反对晁盖这条革命路线的。作品在许多地方渲染晁盖等人只是贪图“一套富贵”，希求“一世快活”，诬蔑具有反抗精神的阮氏兄弟“能生横祸，善降非灾”，并通过宋江的口，用“造反有罪”的反动谬论来贬斥晁盖等人的革命行动。晁盖等人“智取生辰纲”，把封建统治者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夺回来，宋江说这是“犯了迷天之罪”。及至晁盖等人抗击封建王朝的武装镇压，打得官军落花流水，最后上了梁山，宋江又认为这是“灭九族的勾当”，“于法度上却饶不得”。

《水浒》为要进一步否定晁盖在梁山上实行的革命路线，特意安排晁盖中箭身死。原来在龚开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和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中，晁盖都在三十六人以内。而《水浒》却臆造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，无论三十六天罡，还是七十二地煞，都没有了晁盖的位置。书中说得十分清楚：“在晁盖恐托胆称

王，归天及早；惟宋江肯呼群保义，把寨为头。”所谓“托胆称王”就是指晁盖蔑视皇权，敢于对抗封建王朝，所以一定要他“归天及早”；而宋江“尽忠报国”，“呼群保义”，能把梁山义军引向投降，于是就让他“把寨为头”。

《水浒》排斥晁盖，抬出宋江作为梁山义军的领袖，完全是为了宣传投降主义路线的需要。宋江根本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，而是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。这个满脑子“忠孝节义”的孔孟之徒，一心维护封建政权，只想依附封建统治势力博取高官厚禄。他从来仇视“犯上作乱”，自己更是绝无造反要求。在他看来，造反上山是“上逆天理，下违父教，做了不忠不孝的人”。他杀了阎婆惜，外出逃难，只有贵族柴进的门下，花荣的官军营寨，孔明的地主庄园，才是他心目中的安身之处，唯独不想投奔在梁山的晁盖。后来只是由于“名又不成，功又不就”，满腹牢骚，误题“反诗”，在江州问斩，梁山好汉劫了法场，一时走投无路，这才“勉从虎穴暂栖身”，上了梁山。

宋江是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阶级分子，他自始至终竭诚拥戴宋朝皇帝，同封建统治没有任何利害冲突。仅仅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，在所谓“奸邪”的排挤下，使得他“虽有忠心，不能得进步”，没能“做得大事业”，因而同高俅、蔡京一伙不断发生冲突。他们之间的斗争，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。有一种观点认为宋江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双重性格，其实宋江这个投降派从来没有革命性。他一贯忠于皇帝、忠于封建王朝，上山之前反对农民革命，上

山之后又从内部破坏农民革命，他有的只是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主阶级反动性。

宋江的上山，不过是“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”。早在他上山之前，就曾对要上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：“如得朝廷招安，你便可撞掇鲁智深、杨志投降了。日后但是去边上，一枪一刀，博得个封妻荫子，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。”这一番劝导武松的贴心话，正表明他一生要走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。上山之后，他就用这种地主阶级反动的世界观来改造农民起义队伍，逐步篡夺山寨的领导权。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，他全然无视晁盖的领袖地位，山寨的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，往往只由他一人做主，以致从四面八方来投奔梁山的人，只有“及时雨”，不知有晁天王。从大闹江州以后，梁山义军打祝家庄、高唐州、青州、华州等几次重大战役，都由宋江统率军马，晁盖只是担负着看守山寨的任务。每当晁盖表示要亲自下山时，宋江总是说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”。表面上爱护晁盖，其实是有意把晁盖架空，树立自己的威信，为篡夺领导权积累资本。等到晁盖在曾头市中箭身死，宋江便水到渠成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。尽管宋江身穿重孝，“比似丧考妣一般，哭得发昏”，并在正厅上香花供奉起“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”；实际上却偷天换日，大搞修正主义，全面篡改了晁盖坚持与封建统治者斗争到底的纲领和路线。

就在宋江当了梁山领袖的当天，第一件事便是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，这正是把农民坚持斗争的起义路线篡改成

效忠于地主阶级的投降路线的一个严重步骤和明显标志。从此，这条投降主义路线便在梁山起义队伍中公开化、合法化了。“义”是有阶级内容的。“聚义”的“义”就是通常说的农民起义的“义”，就是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封建统治。而宋江所提倡的“忠义”，则篡改了晁盖“聚义”的内容，只有追随他效忠于皇帝和朝廷才算做“义”。这个“忠义”正是他用来束缚农民起义军手脚的精神枷锁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器。

宋江篡权成功，“替天行道”便正式成为他在梁山大搞修正主义、投降主义的一面旗帜。“替天行道”是什么货色？作者借九天玄女的口告诫宋江：“汝可替天行道：为主全忠仗义，为臣辅国安民，去邪归正。”所谓“天”，就是封建王朝及其最高代表皇帝的象征，神权和君权的统一；所谓“道”，就是“全忠仗义”、“辅国安民”，即用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。要想“替天行道”，就必须“去邪归正”，走接受招安的投降道路。显然，宋江向人吹嘘的“替天行道”，不过是叛卖农民革命，替宋王朝效犬马之劳而已。

就这样，宋江身在梁山，干的是宋王朝代理人的勾当，全面篡改了梁山起义的目标、性质、纲领、路线，取消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，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纳入了地主阶级的轨道，彻底葬送了梁山的农民革命事业。宋江在梁山的全部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，就是受招安。

为了受招安，宋江大造投降舆论。梁山泊排座次时，他公然声称“惟愿朝廷早降恩光，赦免逆天大罪”；在菊花会上，又明目张胆地鼓吹“望天王降诏早招安，心方足”。这种投降论

调，他不厌其烦，逢人便讲，成了口头禅。他竭力贩卖孔孟之道，宣扬奴才哲学。在一百〇八人歃血为盟的誓言中，塞进“共存忠义于心，同著功勋于国”的黑货；他宣称造反是“逆天”，而把投降说成是“顺天”，就是要用儒家的“天命论”和奴才道德，消灭起义军的革命思想，为投降铺平道路。

为了受招安，宋江千方百计把极端仇视农民起义的富豪将吏拉上山寨，加强以他为首的投降派的领导班子与骨干力量。卢俊义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。这个大名府的富豪在经过梁山时，竟准备下一袋麻绳，狂妄地要单人独马捉尽梁山好汉。被俘之后，又坚决不肯“入伙”，声称“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”。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，宋江却认为他文能安邦，武能附众，“他时归顺朝廷，建功立业，官爵升迁，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”，一句话，卢俊义具有带领梁山起义军投降的“品德”和“才干”，所以，不惜花费一千两黄金，动用数千兵马，把他弄上山来。从此，宋江有了一个推行投降路线的得力助手。

为了受招安，宋江竟用军事斗争与朝廷进行政治交易。他也曾带兵攻高唐州，闹华阴县，打大名府，但决不是要扩大根据地，夺取宋室天下。正如宋江一伙供认的那样：“旗上大书‘替天行道’，堂设‘忠义’为名，不敢侵占州府，不肯扰害良民，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。只是早望招安，愿与国家出力。”宋江也曾抵抗过前来“征剿”的官军，但对那些带兵的反动将领却是百般宽容、优待，为来日招安留下后路；大败溃逃的，不准追歼；捉住的，“亲解其缚”，“纳头便拜”，口称“死罪”，倾吐着“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”、“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”的衷曲。

宋江的“打”与“抗”只是姿态，“和”与“降”才是本质。“打”是为了“和”，“抗”是为了“降”。

为了受招安，宋江不择手段地与朝廷牵线搭桥。他不仅和所谓“忠臣”宿元景很早就拉上了关系，而且还向他视为奸邪的高俅卑躬屈膝，乞求招安。高俅被捉上梁山，宋江一见，慌忙扶上堂来，跪拜在地，并大摆了三天酒宴，馈赠了数千金礼物，然后毕恭毕敬送出山寨，“专等招安消息”。他甚至亲自出马，溜进东京，走皇帝的宠妓李师师的后门，想通过“枕头上关节”，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。

对于宋江这一系列卑鄙的叛卖行径，《水浒》的作者自始至终采取歌颂的态度。他把宋江一味要做奴才的“忠义”思想，渲染成大义凛然的崇高品德；把屈膝投降说成是“去邪归正”；把接受招安说成是“终成正果”；而且用浓墨重彩描画招安时的场面：“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，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”，“结采悬花”，“鼓乐喧天”，“异香缭绕”，这个葬送农民革命的灾难时刻竟成了盛大的节日。作者高唱“一封恩诏出明光，伫看梁山尽束装”的赞歌，鼓吹投降的反动面目暴露得何等清楚！

宋江的投降活动，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和抵制。就在那一次菊花会上，宋江用《满江红》词鼓吹招安，立即遭到反对。李逵忿激地说：“招安，招安！招甚鸟安！”一脚把桌子踢起，摔个粉碎。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，阮小七目无天子换御酒，李逵撕毁诏书骂徽宗，吴用则指责宋江对招安太“执迷”了。但是，领导权不掌握在革命派手里，宋江利用他篡夺的权力，软硬兼施，以反革命两手镇压革命派。他经常说什么

“情分最重”，讲什么“死生相托”，企图用这条绳索把大家拴在他的指挥棒上；如果有人不把宋朝皇帝放在眼里，坚持要把农民起义的事业进行到底，他就凶相毕露。李逵反对招安，宋江立即要把他推出斩首，只是由于众人讲情，才寄下“项上一刀”，“再犯，必不轻恕”。这一切说明，梁山起义军的失败，完全是由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，投降；而李逵、吴用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是好的，他们是不愿投降的。

必须指出，与热情地歌颂宋江的投降路线相反，作者对于革命派反招安的正义立场是否定的。在作品中，宋江的投降路线始终占着统治地位，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只处于陪衬的地位。革命派的每次反抗行动，作者都要抬出宋江的“忠义”压下去，并且让他们最后都跟着宋江去受招安，征方腊，抹煞了他们的革命性，对革命派的形象作了严重歪曲。

在《水浒》的评论中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，把宋江的投降说成是“农民的历史局限性”。这是把宋江的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强加在农民头上，是对农民阶级的诬蔑。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，广大农民曾多次地举行起义，前赴后继，不屈不挠，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。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，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，他们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，从斗争的结局上说，总不免陷于失败。但是，通过斗争，总是打击了封建统治，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而叛变投降，则是放弃了斗争，适应地主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，怎么能将这二者混为一谈呢？把斗争不屈而失败和为了升官发财而投降说成是一

回事，就抹煞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、坚持起义的路线和坚持投降的路线的原则界限，是不折不扣的阶级调和论。

投降派的发展规律，必然是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叛卖活动，到直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；从搞修正主义、投降主义，到赤裸裸地执行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。**宋江投降了，就去打方腊。**公然打起“顺天”、“护国”的旗帜，死心塌地地顺皇帝的旨意，去护地主阶级之国了。宋江主动讨到“圣旨”，“部领兵马前去征剿”方腊起义军，咬牙切齿地发誓：如不“诛尽杀绝，誓不回兵”，穷凶极恶地屠杀革命人民，把他们“割腹剜心”。这同他在梁山上对待官军将士的态度是多么鲜明的对照！“宋江重赏升官日，方腊当刑受刚时”，投降派宋江就这样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“安抚使”的官位，用造反者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锦袍。鲁迅评《水浒》评得好：“一部《水浒》，说得很分明：因为不反对天子，所以大军一到，便受招安，替国家打别的强盗——不‘替天行道’的强盗去了。终于是奴才。”

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，《水浒》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，宋江其人则是革命人民的一个反面教员。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，关于《水浒》的许多评论，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正确论述。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《水浒》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，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，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。我社原先采取金圣叹删去二十多回的本子作整理出版的底本，多次印行，长期未能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和要害，不是把《水浒》作为反面教材，而是当作进步作品，加以传播，这也是原则性的错误，同样需要澄清，以肃清不良影响。

建国初期，在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时，毛主席就指出，象武训那样的人，“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，这种丑恶的行为，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？”毛主席还指出，“在许多作者看来，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，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；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，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，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。”毛主席的这些深刻的分析，对我们研究和评论《水浒》同样具有指导意义。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武器，批判《水浒》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，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、投降主义的真面目，从《水浒》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，总结历史经验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，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，这不仅对于古典文学研究，而且对于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教育各个领域，对于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，坚持马克思主义，反对修正主义，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。

《水浒》成书于元末明初。作者相传不一，有的说是施耐庵，有的说是罗贯中，有的说是施作罗编。从明代中叶开始，《水浒》大量翻刻、流行。目前见到的最早刻本，是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刻的百回本，残存数回。现存较早的百回本是明万历年间刻的天都外臣序本。稍后的容与堂刻本，就是以这个本子作为底本的。百回本的后半部从宋江贩卖农民革命得